

论法兰克福学派理性批判思想及其当代意义

阳海音

(武汉工业学院 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科研部,湖北 武汉 430023)

【关键词】 工具理性;生活世界殖民化;交往合理性

【摘要】 霍克海默、阿多诺、马尔库塞等第一代法兰克福学派思想家提出,用新理性取代单一的工具理性以实现人的解放和社会解放。霍克海默和阿多诺认为,艺术是逃避工具理性和物化的最后避难所,现代性的救赎之光只有通过艺术的瞬间经验才能投向这个世界。马尔库塞认为,科技理性造成了肯定性的思维方式和单向度的社会,但他认为,不应该全盘抛弃科技理性。科技理性在计划和开发可用资源等方面,仍然是至关重要的。他主张,人们应该树立一种新理性观念。这种新理性是一种包含批判和否定精神的历史理性,它是工具理性和价值理性的统一,是科学理性和艺术理性的统一,是理性与感性、幸福的统一。第二代法兰克福学派的理论家哈贝马斯批判了晚期资本主义社会由于目的合理性的泛滥导致的生活世界殖民化现象,提出用交往合理性取代单一的目的合理性,建立话语民主的社会是克服生活世界殖民化的根本途径。法兰克福学派试图拯救和重建理性,并探讨了如何建设一个合理化社会的问题。当代中国同样面临着如何守护价值合理性、抑制目的合理性的过度膨胀问题。法兰克福学派的理性批判思想提示我们,理性是多侧面、多向度的,要解决当代中国面临的问题仍然需要大力倡导和弘扬理性精神,理性的潜能并未枯竭。

【中图分类号】 B505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7-6425(2012)02-0112-05

对理性的反思和批判是20世纪哲学发展的一条重要线索。许多思想家将对理性的批判与对当代资本主义社会的批判、对人类文明发展进程的思索结合在一起。法兰克福学派是当代西方的一种社会哲学流派,以批判的社会理论著称,由德国法兰克福社会研究所的领导成员在20世纪30-40年代初发展起来,其社会政治观点集中反映在霍克海默、阿多诺、马尔库塞、哈贝马斯等人的著作中。理性批判思想是其重要内容。本文拟阐述法兰克福学派的理性批判思想,并分析其对当代中国的现实意义。

早期法兰克福学派继承了马克思·韦伯理性批判的传统。马克思·韦伯区分了目的合理性和价值合理性,他认为资本主义社会是目的合理性不断增长,而价值合理性不断衰落的社会。在资本主义社会之前,价值合理性在社会中占主导地位,在资本主义社会产生之后,目的合理性在社会

生活以及人们的头脑中逐渐占据了统治地位。马克思·韦伯认为,在现代社会,目的合理性的片面发展必然导致“意义丧失”和“自由丧失”。所谓“意义丧失”,是指在西方,经过启蒙运动以后,能够为世界的统一意义提供依据的宗教信仰逐步消逝,人们无法对世界作出整体的把握,无法提供对世界、对人生终极意义的解释。“我们这个时代,因为它所独有的理性化和理智化,最主要的是因为世界已被祛魅,它的命运便是,那些终极的、最高贵的价值,已从公共生活中销声匿迹,它们或者遁入神秘生活的超验领域,或者走进了个人之间直接的私人交往的友爱之中。”^[1]所谓“自由丧失”,是指官僚体制和计算性思维扩展到社会的各个领域中,使生活在现代社会中的人的个性和自由受到压抑,造成人的独立价值不复存在。总体上来说,韦伯对人类文明的发展前景持一种悲观态度,他认为,我们面对的不是花团锦簇的夏日,而是冰冻冷酷的冬夜。

那么,身处这样一个环境,我们应该怎么做

【收稿日期】2011-10-27

【作者简介】阳海音,女,湖南安仁县人,武汉工业学院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科研部副教授,哲学博士。

呢？韦伯认为，我们应该坚持禁欲主义的责任伦理传统，做一个勇于负责的人。正如马丁·路德说的：“真正令人感动的是一个成熟的人，无论其年岁大小，他为自己的行动后果负责任并以全身心感受这一责任。他按照责任伦理行事，当某种事情来临时，他会说‘这就是我的立场；我只能如此’。这是一个真正的人和令人为之感动的人。我们之中的每个人，只要精神尚未泯灭，必然会在某个时刻发现自己处于这种情况。”^[2] 韦伯认为，一个真正有希望的社会应该将工具理性和价值理性结合起来，这样，人类社会才有可能从渺无希望的黑暗中解脱出来。

霍克海默、阿多诺、马尔库塞等早期法兰克福学派思想家同样对工具理性以及人类文明的发展前景持悲观态度。

霍克海默和阿多诺明确区分了两种类型的理性。在《理性之蚀》中，霍克海默指出，理性分为主观理性（工具理性）和客观理性（批判理性）两类。主观理性强调手段与目的的可能的协调，在霍克海默那里，主观理性也就是韦伯所说的工具合理性，它的价值由对人和自然界的操纵来衡量，一种活动是合理的，仅当它为某一目的服务。

霍克海默认为，与主观理性（工具理性）不同，客观理性（批判理性）是实在固有的一个原则，是一种生活方式，即一种与生命和自然谋求和谐的方式，它提出一个“真理的”和谐世界的可能性；处于客观理性核心的，不是对行为和目的的归整，而是概念，这些概念所处理的是至高的善，是人的定义问题，是如何实现最高目标的方法问题。客观理性所牵涉的问题，是有关世界观如何理性化，人类世界如何从属于宇宙秩序的本体论思考。客观理性强调对现实的批判和超越，它以人的解放和自由作为最高目标，因此，它是一种批判的理性。

在对理性进行区分后，霍克海默和阿多诺以批判理性为武器展开了对工具理性的批判。在他们看来，工具理性以内在化的同一性为基础，根据自然科学的方法论和思维模式，以量化、形式化作为知识标准来衡量人类的一切知识；工具理性把世界抽象为“空洞的实在”，否认世界的任何主体性的经验和感觉，剥夺了其可能的丰富属性；工具理性关注的是实用的目的，将事实与价值严格区分。说到底，工具理性是一种单面性或肯定性的思维方式，它排除了思维的批判性和否定性，其本质就是维护统治的合理性。

在批判工具理性的基础上，霍克海默和阿多诺确立了批判理论的基本原则：彻底的否定和非同一性原则。在《否定的辩证法》中，阿多诺开宗明义，直接道明自己建立彻底否定的原则的目的和意图：“否定的辩证法是一个蔑视传统的词组。早在柏拉图之时，辩证法就意味着通过否定来达到某种肯定的东西：‘否定之否定’的思想形象后来成了一个简明的术语。本书试图使辩证法摆脱这些肯定的特性，同时又不减弱它的确定性。”^[3] 他认为：“辩证法是始终如一的对非同一性的意识。它预先并不采取任何一种立场。”^[4] 至于非同一性的合法性则是毋庸置疑的，因为历史中的客体自身就是非同一性的，在他看来，所有事物都是一个矛盾体，因此他提出了“矛盾就是非同一性”的著名论题。

如何拯救理性，拯救当代资本主义社会呢？阿多诺认为，现代性的救赎之光只有通过艺术的瞬间经验才能投向这个世界。“一个自由的社会将自身置于这样的情境，即抛弃虚假代价的非理性和功利的手段——工具的合理性，这一理想在艺术中得到揭示，并赋予艺术以社会的爆炸力。”^[5] 在阿多诺看来，艺术是彻底的否定和非同一性原则的体现。为了区别于文化工业意识形态，真正的艺术必须否定文化工业提供的人类需要虚假满足的形象，强调它的否定性和真理性，以对抗文化工业的肯定性和娱乐性。艺术是逃避工具理性和物化的最后避难所。

马尔库塞在其《单向度的人》、《爱欲与文明》、《理性和革命》等著作中考察了理性概念的丰富内涵，着重对科技理性及其对当代社会产生的危害作了深刻的揭示和分析。

马尔库塞认为，理性是一个在历史上变化着的概念，具有丰富的内涵。他列出了理性在哲学史上出现的五种含义，即：1. 理性是主体客体相互联系的中介；2. 理性是人们借以控制自然和社会从而获得多样性满足的能力；3. 理性是一种通过抽象而得到普遍规律的能力；4. 理性是自由的思维主体借以超越现实的能力，理性的概念包含着按照理性行动的自由；5. 理性是人们依照自然科学模式塑造个人和社会生活的倾向^[6]。其中，马尔库塞着重分析了理性的第5种含义。他认为，理性原来是一种超越现实的批判能力，是一种批判的理性；而在自然科学中，理性的批判性逐渐为工具性所取代。依照自然科学的模式塑造人和社会生活已成为当代理性主义的显著特征。但理性

越是表现为科技理性,人在社会生活中就越不自由。随着理性在技术和自然科学中的成功,批判和理想的因素慢慢消失了。

马尔库塞批判的科技理性相当于韦伯的工具理性,即是说,理性本身成为达到某一目的的工具或手段。然而,与韦伯不同的是,马尔库塞不仅将科技理性视为人类政治经济等行动的自发驱动力,还将科技理性当作统治的自觉形式:“科学——技术的合理性和操纵一起被熔接成一种新型的社会控制形式。”^[7]

马尔库塞认为,发达工业社会建立在科技理性的基础之上。科技理性泛化到社会的经济、政治、文化、思想领域,导致了批判的停顿,对立面的一体化,是一种控制的新形式。因此,发达工业社会似乎是理性的具体体现,但这个社会作为总体却是非理性的。发达工业社会的非理性体现在政治、文化、语言、哲学等领域。

马尔库塞认为,科技理性最可怕的后果是使个人的思想和行为、个人所具有的各种机能达到一体化。在科技理性支配下,“人类生存不过是一种材料、物品和原料而已,全然没有自身的运动规律。这种僵化的状况也影响了本能、对本能的抑制和改变。原来的动态本能现在变为静态的了,自我、超我和本我之间的相互作用凝聚成了机械反应。超我的僵化伴有自我的僵化,它的表现就是在不恰当的时间和地点产生了僵化的性格和态度。意识越来越缺少自主性,它的任务范围缩小了,它只须使个体与整体相协调”^[8]。

人们如何才能获得拯救呢?马尔库塞认为:“正是文明本身给现代人造成这种创伤,因而只有一种新的文明才能治愈这种创伤。”^[9]资本主义文明通过科技合理性改变人的本能结构从而造成人的自我异化。扬弃人的自我异化需要进行本能革命,即解放人的爱欲。“爱欲”是人的机体对普遍快乐的一种追求,爱欲的解放意味着使人的整个身心都获得全面持久的快乐。马尔库塞认为,通过推翻资本主义社会,消除异化劳动,可以树立“新感性”或“感性的理性”,消除人的自我异化的根源,实现社会和人的解放。

总之,马尔库塞一方面批判了资本主义社会片面发展科技理性所导致的种种危害,如人们批判精神的丧失、消费主义、拜金主义的盛行、人的心理——本能结构的深层压抑等;另一方面,他又指出不能因噎废食,全盘抛弃科技理性,科技理性在计划和开发可用资源等方面,仍然是至关重要的。

他主张人们应该树立一种新理性观念。这种新理性是一种包含批判和否定精神的历史理性,它是工具理性和价值理性的统一,是科学理性和艺术理性的统一,是理性与感性、幸福的统一。

二

作为第二代法兰克福学派的杰出代表,哈贝马斯也将对理性的批判与对资本主义社会的批判结合在一起。

哈贝马斯对晚期资本主义社会的开始时间和具体特征作出了界定和分析,并具体阐述了晚期资本主义社会的四重危机。他认为,晚期资本主义社会存在着经济危机、合理性危机、合法化危机、动机危机等四重危机。其中,合法化危机和动机危机是最为根本的。也就是说,晚期资本主义社会最根本的危机是文化和意识形态危机。哈贝马斯认为,“公平交换”是自由资本主义社会的合法性基础,到了晚期资本主义社会,“公平交换”的意识形态瓦解了,科学技术成了新的合法性基础行使意识形态功能。科学技术意识形态掩盖了目的理性的活动和相互作用之间的差异,导致人们混淆劳动和实践、系统和生活世界,由此导致生活世界自我调节能力弱化,系统逐渐侵入生活世界,使生活世界越来越金钱化、官僚体制化。因此,当代资本主义的根本问题不是经济保障、社会保障、军事保障等旧的政治主题。问题来自生活世界的殖民化,也就是由于目的合理性泛滥导致的货币和权力对团结的侵蚀。

哈贝马斯认为,存在着两个方面的进化,一是系统的进化,即经济和政治方面的现代化、合理化;二是生活世界的进化,即社会文化、社会交往方式的现代化、合理化。当代资本主义社会的主要问题是金钱和权力侵蚀到生活世界。对当代资本主义的批判主要应是对生活世界殖民化的批判,对资本主义的改造主要应是对社会文化、生活世界的改造。

如何改造生活世界呢?哈贝马斯认为,生活世界产生的问题是由于目的合理性的入侵。因此,关键要重建新的理性概念,这种新的理性概念就是交往合理性。哈贝马斯的交往理性集理论理性、实践理性和审美理性于一身,对应着外在的客观世界、社会世界和人自身的主观世界,是一种典型的整体理性。他认为,社会发展如果以交往理性为基础要比单独以工具理性为基础更具合理性。他认为,交往理性告诉我们,这个世界除了金

钱和权力之外,还有其他的東西。交往理性使生活世界得到重新整合,使民主、公正的原则在政治、经济和法律体制中得到真正的贯彻,它克服了由现代性所导致的“意义丧失”和“自由丧失”,使现代化、社会合理化在健康的环境下逐步推进。

如何实现交往合理性呢?哈贝马斯提出三条途径:一是选择恰当的语言进行对话,二是承认和重视共同的规范标准,三是建立话语民主的社会。这其中,建立话语民主的社会是哈贝马斯设计的改造当代资本主义社会的具体理念和制度模式。他认为,实行话语民主的交往共同体应该是资本主义发展的方向。

哈贝马斯认为,随着交往合理性的实现,“货币循环过程和权力循环过程必然受到个人生活的行为领域和自发的公众社会的交往结构化的行为领域的限制;经济和公众社会管理的货币循环过程和权力循环过程,同时也必须与个人生活的和自发的公众社会的交往结构化的行为领域相区别;否则,这些循环过程还会更多地用其经验的和官僚主义的理性的不妥协形式,侵犯生活世界。从生活世界的理解资源中产生的,以及并非通过国家化的政党建立起来的政治交往,必须保卫生活世界的边界和强调生活世界的绝对命令,即实际的价值定向要求”^[10]。

三

法兰克福学派认为,资本主义社会是目的合理性占据主导地位的“单向度”的社会,他们力图将现代人类从自我异化中解救出来。他们的思想对于当代中国具有重要的启示。作为社会主义国家,中国在建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全面推进现代化的过程中,由于种种复杂原因,社会风尚、人们的思想观念发生了一些变化,这其中有积极的,比如人的独立性以及自主意识不断增强、崇尚效率等;也有消极的,比如一些人的生活越来越倾向于功利追逐和物质享受,行为功利化和官僚化,严重的腐败现象等。无论是文化事业,还是教育、体育、医疗等事业,都被贴上了商品的标签,商业化、产业化的气息已越来越逼近各行各业。从这些消极现象,我们可以感受到当代中国同样面临着如何守护价值合理性,抑制目的合理性的过度膨胀问题。如何消除这些负面现象呢?上述几位思想家的思想从不同侧面、不同角度给予我们一些启迪。霍克海默和阿多诺倡导否定的艺术,强调真正的艺术不是简单地顺从人类,而是对人类深陷

其中的僵化的社会关系的抗议,他们以艺术体现的批判理性来对抗工具理性和文化工业。马尔库塞倡导以新理性取代单一的工具理性,批判工业文明把既有物质需要又有精神需要的双面的人变成完全受物质欲望支配的单面人,主张人的解放不仅是物质—技术层面的,而且是心理—本能层面的。当代中国要消除现代化中的负面效应,就必须对这些思想进行认真的研究和吸取。

第二代法兰克福学派代表人物哈贝马斯分析的由于目的合理性侵入生活世界导致的生活世界殖民化现象在当代中国也是一个值得关注的现象。对于执政党和政府以及理论工作者来说,如何抵御目的合理性对于文化、社会规范以及人们的个性结构的影响,避免金钱和权力因素侵蚀社会的文化和价值观系统确实关系到社会主义事业成败、关系到民族和国家生死存亡。哈贝马斯设计的方案是拯救和重建理性,以交往合理性概念取代片面的目的合理性概念。这一抽象的哲学设想在现实中的具体实现途径即是要强调民主的对话、讨论,将民主的对话、讨论作为国家政治生活的基础和中心,通过对话、讨论,逐步提升国民的政治参与意识和道德实践意识。笔者认为,生活世界殖民化现象的产生,涉及到经济、政治、文化、人们的价值观念等方面的因素;因此,要消除这一现象,是一个漫长而复杂的系统工程,需要从发展经济、深化政治体制改革、加强文化建设和公民道德建设等方面进行努力。哈贝马斯提倡的民主对话、增强公民的政治参与意识和道德意识是其中的重要方面。因此,从哈贝马斯的一些论述中,我们可以获得有益的借鉴。比如,哈贝马斯在分析什么是交往合理性时探讨了什么是恰当的语言,我们应该如何说话的问题。他认为,一个在交往意义上有效的语言应该满足四个条件,即可领会性、真实性、真诚性和正当性。他特别强调后面三个条件,即真实性、真诚性和正当性。笔者认为,人际交往是通过语言进行的,哈贝马斯通过交往合理性概念,为人们如何建立和谐的人际关系指明了方向,真实、真诚、正当也是我们应该努力遵循的道德原则。又比如,哈贝马斯探讨了什么是理想的话语环境问题。他认为,理想的话语环境要满足以下条件:每一个有语言和行为能力的主体在自觉放弃权力和暴力使用的前提下,自由、平等地参与话语的论证,并且,在此过程中,人人都必须怀着追求真理、服从真理的动机和愿望。不但如此,通过话语共识建立起来的规则,还必须为

所有人遵守,每个人都必须为实行这种规则所带来的后果承担责任。其中,哈贝马斯特别强调“包容他者”的重要性,他强调要充分保障边缘人、弱势群体、少数民族的话语权利。笔者认为,“包容他者”、站在他者的视角思考问题,关爱弱势群体,充分保障弱势群体的权利,是我们特别需要培养和加强的,也是政府和执政党需要时时放在心上的事情。再比如,哈贝马斯提倡大力发展自由、独立的公共领域和市民社会,建立话语民主的社会,以此来抵制生活世界的殖民化和政治权力的腐败。在当代中国同样也面临着建设民主政治的问题。哈贝马斯所提倡的让公共领域和市民社会对国家的立法、司法和行政机构进行全面的

监督,让话语形成的交往权力对国家的行政权力和管理权力施加影响,这对于中国的民主政治建设具有一定的借鉴意义。

总之,笔者认为,利奥塔等后现代主义者由对理性的批判而走向了非理性主义,法兰克福学派则认为启蒙是一个尚未完全实现的方案,启蒙产生的问题要由进一步的启蒙来解决,他们试图拯救和重建理性,并探讨了如何建设一个合理化社会的问题。他们对理性的拯救和重建提示我们,理性是多侧面、多向度的,要解决当代中国的问题仍然需要大力倡导和弘扬理性精神,理性的潜能并未枯竭。

[参 考 文 献]

- [1] 马克思·韦伯:《学术与政治》,冯克利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8年版,第193页。
 [2] 苏国勋:《理性化及其限制:韦伯思想引论》,上海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第98页。
 [3][4] 阿多诺:《否定的辩证法》,张峰译,重庆出版社,1993年版,第1、3页。
 [5] Adorno. *Aesthetic Theory* [M], Routledge and Kegan Paul, 1984:323。
 [6] 马尔库塞:《理性和革命》,程志民等译,重庆出版社,1993年版,第231-234页。
 [7] 马尔库塞:《单向度的人》,刘继译,上海译文出版社,1989年版,第151页。
 [8][9] 马尔库塞:《爱欲与文明》,黄勇、薛民译,上海译文出版社,1987年版,第73、15页。
 [10] 哈贝马斯:《交往和生产力——答H. P. 克鲁格》,《哲学动态》,1992年第6期,第53页。

On Frankfurt School's Critique of Rationality and Its Contemporary Significance

YANG Hai-yin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Theory of Education and Research Department, Wuhan Polytechnic University, Wuhan 430023, China*)

Key Words: instrumental rationality; life world colonization; communicative rationality

Abstract: The first generation of Frankfurt School thinkers, such as Horkheimer, Adorno and Marcuse state that we should develop a new rationality to replace the single instrumental rationality so as to realize the human and social liberation. Horkheimer and Adorno think that art is the last refuge to escape the instrumental rationality and the materialization, the light of modernity redemption comes to the world only through art experience. Marcuse thinks the instrumental rationality results in a positive way of thinking and the one-dimensional society, but we should not abandon the instrumental rationality totally. Instrumental rationality is still critical in the planning and development of available resources and so on. He argues that we should set up a new idea of rationality. This new rationality is history reason consist of the critical and negative spirit. It is the unity of instrumental rationality and value rationality, scientific rationality and art rationality, the unity of sense and sensibility, and the happiness. Habermas, the most famous member of the second generation of Frankfurt School theorists, criticizes the life world colonization caused by the objective rationality in the late capitalist society. Habermas thinks that we should replace the single objective rationality with communicative rationality and practise the discourse democracy so that we can overcome the colonization of the life world. Frankfurt School try to save and reconstruct the rationality and discuss the problem how to construct a reasonable society. Contemporary China is also faced with how to protect the value rationality, inhibit excessive expansion of instrumental rationality. Frankfurt School's thoughts of the rationality critique tell us that rationality is multi-dimensional and we still need to advocate and promote the rational spirit in contemporary China.

[责任编辑:李文亚]